

走出西方文明的危机：“万物统一”的文学批评

Out of the Crisi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of “Total Unity”

张杰 (Zhang Jie) / 栾昕 (Luan Xin)

内容摘要：西方文明在注重实证和科技给人类文明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价值的缺失。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是沿着“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研究路径，顺着哲学研究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线索展开。这种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发展。本论文从当代东正教“万物统一”的美学思想出发，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三位一体”，结合文学文本分析，努力探索一条值得借鉴的文学批评途径。

关键词：俄罗斯文论；东正教；索洛维约夫；西方文明

作者简介：张杰，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符号学、比较文学、俄罗斯文学与文论等方面研究。栾昕（通讯作者），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5ZDB0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ut of the Crisi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of “Total Unity”

Abstract: Western civilization emphasizes that empirical research, together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ings prosperity to human civilization. However, it also leads to the lack of spiritual value to a certain extent.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also follows the research path of “one divides into two, binary opposition,” and follows the two clues of rationalism and empiricism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is way of thinking and criticism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theory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aesthetic thought of “Total Unity” of the contemporary Orthodox Church, this paper takes the thinking mode of “trinity” instead of “binary opposition,”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a way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s worthy of learning.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Orthodox Church; Solovyov; western civilization

Authors: Zhang Ji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nd he is als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emio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z-jie1016@hotmail.com). **Luan Xi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Doctor of Arts and Postdoctoral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er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luanxin90@mail.ru).

当代西方社会文明的繁荣几乎可以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榜样，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在朝着发达国家文明的方向前进。这里的文明显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以及人的受教育程度等，而且导致西方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就是西方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然而，早在 19 世纪下半期，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哲学家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вьев 1853-1900）就在自己的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Кризис запад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отив позитивистов]*，1874）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后来又在其代表作《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чала цельного знания*，1877）中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索洛维约夫深刻地揭示，西方的哲学研究采取的是“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二元论，前者又可以分成理性与信仰两个世界，后者则更多是现实世界。他明确写道：“当思维着的人把自己的思维和一般信仰区分开来，并使之与作为外在事物的这种信仰对立起来时，也就开始有了哲学”，因此“西方哲学以作为智力的个人思维与作为权威的全民信仰的分裂为起点”（索洛维约夫 195）。到了 17 世纪，西方哲学界发生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这种二元对立转化为理性与自然的对立。学界把真理视为是人类认识的结果，即人的认识与对象相吻合便是真理。

长期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是沿着“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研究路径运行的，顺着哲学研究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线索展开。在文学批评理论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成为两大对立的文学创作传统，延续着古希腊以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不同文学观和创作传统，无论是哪个流派，无外乎都可以归入这两大传统之一。这种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的发展，甚至让我们渐渐丢失了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整体性、感悟式文本意义把握的传统。本论文从当代东正教“万物统一”的美学思想出发，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为“三元融合”、“三位一体”，结合文学文本分析，努力探索一条值得借鉴的文学批评途径，以期为我国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西方文明的批判：二元对立与三元融合

西方文明注重实证和科技的倾向确实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正如弗·谢·索洛维约夫所指出：“社会领域的经济社会主义，知识领域的实证主义，创造领域的功利主义的唯实主义，这些就是西方文明的最新成就”（索洛维约夫 184）。然而，为什么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的伦理、人们的信仰、民族的精神等却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感到有所缺失呢？高科技在不断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又该如何提升社会的精神价值的作用呢？西方的实证科学和哲学思维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应如何认识呢？

显然，西方实证科学和哲学研究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是深刻而又明显的。表现主义以艺术的本质是“直觉”表现，来区分于其他“理性”的事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把人的心理世界划分为“意识”与“无意识”。俄国形式主义也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借鉴了索绪尔对语言学的划分，即“共时性语言学”与“历时性语言学”。文艺符号学同样把文艺作品视为情感符号，以此与其他日常生活文本相对立。新历史主义批评更是把历史主义批评分为“旧”与“新”，前者是从作者创作的历史环境、规律来考察，后者则从读者接受的阐释语境来分析，前者意义是“归一”的，后者则是“多元的”，等等。这种“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能够更加科学化地研究文学现象，但是缺失的却是对文学现象的精神层面把握。

在当代西方的语言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甚嚣尘上。在西方的文艺批评中，不仅科学分析或史实考证式的批评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的权威期刊只发表科学或实证批评的论文，而且各种科学分析理论也不断运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例如精神分析、神经认知等。索洛维约夫进一步深入揭示：“西方文明造就了生命的个别形式和外在材料，却没有赋予人类以生命本身的内在内容；它把单个的因素孤立起来，使它们达到只有个体才能达到的发展极限，却使它们失去了与活生生的精神的有机联系”（索洛维约夫 187）。

索洛维约夫提出的“完整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就是“万物统一”。这也就是主观与客观通过存在联系起来，科学分析和哲学推理均不应该与神学相分离，真正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这三者的有机融合之中，真理存在于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交汇处。白银时代的俄罗斯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们，在探讨真理和世界本源的基础上，把科学、哲学、宗教、艺术、史实等问题综合起来考察。具体在文学研究中，他们不仅揭示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层面的反映，而且更是对包括信仰在内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应该由新的文明来取代，而新的文明必须是三位一体的，是与神圣本原密切相连的。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家伊·阿·叶萨乌洛夫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Есаулов) 在《俄罗斯经典：新理解》(*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новое понимание*, 2017) 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对待研究客体的基本态度可以分为两种：针对研究对象的这种或那种的外部阐释，以及对于现象所需要的内部理解。‘研究’绝对不是‘理解’。如果说‘研究’既存在于人文学科，也存在于非人文学科，那么理解就是‘精神学科’所特有的”，“一般对待客体对象持两种态度：‘物体’、‘个性’。与此相对应的前者是‘自然的科学属性’，主要是知识的独白形式，后者则是认识的对话积极性，前者是规律，后者是精神”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Есаулов 7)。在叶萨乌洛夫看来，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的研究均属于前者。他还在书中指出，19 世纪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作家果戈理后期创作的评价，显然是从“研究”出发的，而缺乏以“理解”为基础的“精神”把握。如果能够从精神层面多理解果戈理本人思想的转变，也许更加能够深入体会到作家后期变化的缘由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Есаулов 123-125)。其实，在西方的文学批评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或曰悖论：文学创作的艺术感染力是其区别于非文学文本的关键之所在，文学批评本来是要揭示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但是经过科学化的批评分析以后，这种审美感受便丧失殆尽。例如，结构主义批评本来强调的是文学文本的艺术审美形式，反对仅仅从思想内容出发的批评，但是其研究的结果则是一些毫无艺术魅力的叙事模式或公式。现实主义批评虽然重视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但是依然无法让读者感受到文学阅读的愉悦感。现代主义批评可以摆脱现实生活的层面，深入发掘无意识领域或荒诞变形的人生轨迹，却也难以传递给读者任何艺术的审美快感，等等。科学研究需要切分、细化，甚至对立，而文学批评则更需要整体、融合。文学批评的目的并非只是要帮助读者去“研究”文学创作文本，从某一个视角或用某一种方法，来揭示其思想内涵或艺术形式，而是应该注重引导读者去理解、体验和感受文本的精神价值。这种引导不再把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相对立，而是在这两者的相互融合中，领略到超越文本之上的艺术魅力，从而达到提升读者艺术欣赏力和净化心灵的作用。用文学创作去评价文学创作，用艺术作品去诠释文学理论，也许是一条理想的文学批评途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1923-1985) 的经典小说《寒冬夜行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 1979) 就被视为是对符号学家艾柯的文本诠释理论的元小说式回应。更有不少经典作家把文学叙事与创作阐释融合在作品之中，以此达到相互之间的交融，如 19 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1833) 等。

在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那里，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是探索新的文学批评的起点，从“对立”走向“融合”，由“二元”转向“三元”，则是文学批评的理想途径。只有超越实证科学的批评，才是具有神学魅力的文学批评。人

类对艺术创作的评价最初是非常混沌的，非科学清晰化的，经过长时期的探索渐渐形成了文艺学，开辟了理性化的科学批评之路。然而，正是这一发展又丢失了文学创作本身的艺术魅力，丧失了艺术之魂。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则是要在理性与情感之中，现实与彼岸的世界之间，去探索融合的、“万物统一”的文学批评之路。

二、“万物统一”的批评：哲学的悲剧与悲剧的哲学

伊·阿·叶萨乌洛夫在《世界文化历史语境中的俄罗斯经典文学》(*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мировом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2017)一书中明确指出：“俄罗斯经典文学是俄罗斯的主要民族成就之一，是公认的她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之一”。然而，随后他就又指出了俄罗斯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存在的困境和危机，其“问题在于对俄罗斯经典一元论现象阐释的危机正在日益加深”(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Есаулов 7)。叶萨乌洛夫是从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的立场上，提出这一观点的，他所说的阐释危机显然是与西方哲学或文论的危机相一致的。其实，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作为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坚定的“万物统一”哲学思想的维护者，他一语道破西方哲学的危机和悲剧，并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哲学的悲剧”(波鲁斯 14)。布尔加科夫的哲学研究始终是与俄罗斯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紧密相连的。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尼克利斯基所说：“优秀俄罗斯文学总是哲学化的，如同哲学经常在与文学的联系中，或者完全在文学形式里呈现自己”(尼克利斯基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波鲁斯在题为《俄罗斯哲学与欧洲文化的危机》(*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ризис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可以把布尔加科夫的悲剧称为哲学的悲剧，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专著的名称”(波鲁斯 2)。布尔加科夫的“哲学的悲剧”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哲学运用理性的分析方法，必然陷入悲剧的困境；二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存在的悲剧(尼克利斯基 14)。可以说，对待人生的悲剧性思考，是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在布尔加科夫看来，用悲剧化的哲学理性分析方式，去归纳和分析复杂的文学创作所表现的存在悲剧，显然会陷入危机四伏、极其艰难的困境。不过，布尔加科夫虽然认为，文学批评理论的理性化思维方式是悲剧的，研究的文学对象也是存在的悲剧，但是他并没有彻底否定理性。布尔加科夫坚持的理性是人与上帝之间自由的和道德的联系。“在这种哲学里，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关于自由理性和道德理性的论断，这种理性体现在绝对里，也是人和人类追求的目标”(波鲁斯 3)。

在布尔加科夫那里，理性与信仰是融合在一起的，文学批评应该揭示文学文本中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形成过程又是复杂的。

也正是这种“神学”意义的精神，才是连接主体（作者、读者）与客体（作品、生活）的关键，才是使得文本意义形成的关键。因此，在布尔加科夫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批评中，主体、客体和存在（意义形成）是一个整体，而连接这一整体的是由理性与信仰融合的精神（张杰 113-114）。

当然，布尔加科夫在文学批评中，摆脱了一般宗教哲学理论的束缚，不再把文学创作视为某种“精神”的传声筒，而是“神性”与“魔性”的融合体。他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不再把体现“善”的理想化主人公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作为评论的重点，而是着重剖析了悲剧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伊凡·卡拉马佐夫。伊凡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这一悲剧并非是他的无神论思想，也不是其为所欲为的处事原则，而是他自身的良心拷问和精神折磨。伊凡的性格是极其复杂的、矛盾的，往往纠缠于善与恶、理想与现实、忍耐与暴力之间。其实，在布尔加科夫看来，存在的悲剧并非在于生活的苦难或生命的消失，而主要是在于灵魂的迷茫和困惑，找不到精神的出路。伊凡的悲剧就在于此，人类的悲剧也莫过于此。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哲学的悲剧”批评还是在为现实生活中信仰的丧失，为哲学探索世界方式的理性困惑，而发出悲叹。他的“哲学的悲剧”是建立在信仰与理性相互融合的“万物统一”的思想之下的。

当代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的另一位悲剧式思想家是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Шестов 1866-1938）。从表面上看，他与布尔加科夫的哲学思想，甚至索洛维约夫的理论主张，分歧明显且争论不休。波鲁斯指出：“舍斯托夫的悲剧是悲剧的哲学，这是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一部重要著作的副标题”（波鲁斯 2-3）。“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观点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于理性的理解不同。舍斯托夫所回避的‘理性’与布尔加科夫所希望的‘理性’是两个不同的理性。准确地说，他们对理性有不同的理解。布尔加科夫的理性是人与上帝之间自由的和道德的联系，这是遭遇痛苦的理性，因为它把世界悲剧纳入自身，尝试在自身中解决这个悲剧的矛盾。舍斯托夫所诅咒的理性对人漠不关心，所以人不应该相信它”（波鲁斯 5）。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更加关注的是，个体命运与自满理性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波鲁斯 18）。在布尔加科夫那里，“理性”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而舍斯托夫则以为，如果这样，实际上就是用“理性”来代替信仰，最终导致信仰的丧失。

然而，尽管在对于“理性”的认识上，舍斯托夫与布尔加科夫的分歧很大，但是他们在世界观和文艺观上则又是一致的。无论是布尔加科夫，还是舍斯托夫，都深受索洛维约夫思想的影响，把“万物统一”于精神，视存在为主客体的载体。他们都认为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是悲剧性的。悲剧性产生于理性分析的无奈和理性规范的失败。只不过，布尔加科夫还在为“理性”的悲剧感叹，而舍斯托夫则从根本上就不相信这种“理性”。

在《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цше

(*Философия трагедии*, 1902) 一书中, 当舍斯托夫提及对莱蒙托夫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 的小说《当代英雄》(*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840) 主人公毕巧林的评价时, 曾多次强调, 虽然毕巧林身上集中了一代人的缺点, 但是莱蒙托夫本人在小说的序言中, 则明确指出要“如何医治, 只有天晓得”(舍斯托夫 9)。其实, 舍斯托夫与莱蒙托夫一样, 反对艺术创作的理性分析。他写道: “艺术的任务决不在于, 听命于由各种人依据这种或那种基础想象出来的规则和标准, 而在于冲破那桎梏追求自由的人类智慧的锁链”(舍斯托夫 10)。

在评价契诃夫创作时, 舍斯托夫指出: “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契诃夫在自己差不多二十五年的文学生涯当中百折不挠、乏味单调地仅仅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舍斯托夫 8)。他认为, 剧本《海鸥》(*Чайка*, 1896) 最能够真实体现契诃夫的生活态度。主人公特里果林整日忙忙碌碌, 毫无目的地不停抄写。他既不知晓为什么做, 也不清楚怎样做。这显然是极其荒诞的。契诃夫揭示的正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悲剧, 即生活是无目的的, 大家都昏昏欲睡, 随波逐流, 一旦理性行动, 便就四处碰壁。契诃夫在自己的创作中表明, 人类只有用磨难、绝望, 甚至死亡来抗争理性, 只有深陷绝境, 才能感觉到用理性无法论证的上帝, 向他发出旷野的呼告, 重新找回对上帝的信仰。

在“万物统一”思想的影响下, 布尔加科夫和舍斯托夫分别从哲学的悲剧与悲剧的哲学, 这两条不同的批评途径, 努力揭示文学文本的精神价值。无论这种精神是积极的, 或是消极的, 哪怕是绝望的, 他们都去正视它。文学创作的悲剧感和绝望感不是让人消沉, 而是“通过表现个体的毁灭来埋葬死”, 从而肯定“活人的权利”(舍斯托夫 1)。

三、文本意义的再生机制: 意义的构建与建构的意义

在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及其理论中, 文学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视为是研究的重点, 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文学批评界也习惯于从反映的真实性与表现的审美性, 这两个维度来揭示文学文本的意义和价值。随着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文学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以此来阐释文学文本意义的无限可阐释性。然而, 无论是现实的文本反映, 还是艺术的审美表现, 甚至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 均是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加以实现的, 即“万物统一”于心理过程。可以说, 生活现实、文学文本和心理活动是意义构建的三维, 其中心理活动是纽带, 是统一的关键。也正是这一精神活动, 使得文学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成为有生命力的活物, 可以不断地产生意义。

从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思想出发, 任何文学文本的意义构建都应该是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 是理性与信仰相互融合的心理过程。他曾明

确指出,美是“精神的物质”,是“思想的化身”(Соло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774)。他以金刚石为例,说明金刚石之所以具有美的价值,就在于物质与光的结合,文学文本的美学价值也在于人的精神之光与物质生活的融合。他在《艺术的普遍意义》(Общий смысл искусства, 1890)一文中写道:

“完美艺术的最终任务一定要体现绝对理想,这不仅是在想象空间中。实际上应该体现一种崇高精神,并把它融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Соло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404)。在这里,索洛维约夫强调,美实际上是主体精神的对象化,也就是创作主体与客观现实世界之间的精神联系构建了文学文本。当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否定文学文本反映现实的客观性,他承认:“美在自然中具有客观的现实性”(Соло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555)。但是,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客观世界的美是一定要与精神世界相伴的。这就表明,文学文本反映现实的精神联系是读者意义的构建基础。

在“万物统一”的世界中,精神活动或曰心理过程是最赋予变化的。文学文本意义的构建无疑是变化的、多元的、复杂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为读者提供着无限的可阐释空间。这种文本构建的意义在以变形、夸张、荒诞为特色的现代主义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 1952)表现的是一出极其荒诞的悲剧。在该剧中,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甚至等待的戈多究竟是谁也不太清楚。作者只是想在观众与戏剧表演之间建立一种想象的联系,激发观众无限延伸的可想象空间。可以说,《等待戈多》是由塞缪尔·贝克特对生活认识的精神产物,同时也是该剧与观众想象之间的动态意义构建,剧本的意义再生机制则形成于这种心理的联系过程之中。

其实,即便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中,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也同样形成于“作者→文本→读者”的心理联系之中。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也许屠格涅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前夜》(*Накануне*, 1860)是作者与批评家之间认识迥异,争议最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最终还导致了《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杂志的分裂,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贵族作家退出该杂志,不再为其撰稿。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中最早的一部歌颂‘信任’,即献身事业、有行动的人物的长篇小说”(曹靖华 338)。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讲述的是一位贵族少女叶莲娜·斯塔霍娃与在俄罗斯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战士英沙罗夫的爱情故事。屠格涅夫自己曾经表示,小说要塑造一个自觉的英雄性格,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而不是要写一个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者(曹靖华 338-339)。但是,这种作者的主观意识却在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那里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理解。这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Ко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 1890)一文中,明确表示从该小说中看出了俄国面临着革命的“前夜”,甚至指出:“这一天,它到底是要来的”(杜勃罗留波夫 330)。由于作家屠格涅夫与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信仰和政治

立场上存在极大差异，各自主体与文本构建的心理联系也就迥然不同，因此他们对文本的意义建构就会不一致。或许有读者只单纯地以《前夜》中叶莲娜与英沙罗夫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为线索阅读小说，但应该存在其他阐释方式。

显然，文学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形成于作者与文本、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精神联系的过程之中，这种联系既是理性的、有信仰的，也可能是感性的、无信仰的。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人世间的万物都是统一的，统一于“精神”（索洛维约夫 242）。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应该还存在着“神学”，主观与客观之间必然由心理活动相联系。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万物统一”思想构建了白银时代俄罗斯东正教文学批评理论的灵魂。尽管或许这种思想需要加以唯物主义的批判，但是它毕竟为我们认知世界，分析文学文本，提供了一条值得思考的、“万物统一”的文学批评路径。

Works Cited

- 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第 1 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Cao Jinghua ed. *Literary History of Russia and Soviet Union*. Vol. 1. Zheng Zhou: Henan Education Press, 1992.]
- 杜勃罗留波夫著：《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 2 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Dobrolyubov, Nikolay Alexandrovich. *Selection of Dobrolyubov*. Vol. 2. Trans. Xin Weia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3.]
- Соловьев 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чинения. В2т. Т.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88.
[Solovyov, Vladimir Sergeevich. *The Complete works. 2 volumes*. Vol. 1. Moscow: Publisher Мысль, 1988.]
- Есау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нов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ХГА, 2017.
[Esaulov, Ivan Andreevich. *Russian classics: a new understanding*. Saint- Petersburg: Publisher ПХГА, 2017.]
- Есау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Сытина Юл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арасов. *Рус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дрик, 2017.
[Esaulov Ivan Andreevich, Sytina Yuliya Nikolaevna, Tarasov Boris Nikolaevich. *Russian classic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ontext*. Moscow: Publisher Indrik, 2017.]
- 谢尔盖·安纳托利耶维奇·尼克利斯基：《俄罗斯文学的哲学阐释》，张百春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 年。
[Nikolsky, Sergey Anatolevich.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Trans. Zhang Baichun. Hefei: Anhui UP, 2017.]
- 弗拉基米尔·纳塔诺维奇·波鲁斯：《俄罗斯哲学与欧洲文化的危机》，张百春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 年。

[Polus, Vladimir Natanovich. *Russian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Trans. Zhang Baichun. Hefei: Anhui UP, 2017.]

列夫·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方珊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Shestov, Lev. *Beginnings and Ends*. Trans. Fang Shan. Kun Ming: Yunnan People's Press, 1998.]

列夫·舍斯托夫：《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张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

[Shestov, Lev. *The Philosophy of Tragedy, Dostoevsky and Nietzsche*. Trans. Zhang Jie.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2.]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Solovyov, Vladimir Sergeevich. *The Crisis of Western Philosophy*, Trans. Li Shubo. Hang 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张杰等著：《20世纪俄苏文学批评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Zhang Jie et al. *The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ry Criticism in 20th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P, 2017.]